
***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Edited by Ping WANG and Nicholas Morrow WILLIAM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26.**

唐佩璇 周睿

西南大學文學院

文化身分的確立與疏離是當下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ic Studies）的核心議題之一，正如新加坡作詞人李瑞洵（本名林秋離）和香港作詞人陳少琪各自在流行歌曲《江南》同一旋律中用「當夢被埋在江南煙雨中」（國語版）和「迷途戀人們以為江南情不變」（粵語版）進行在地想像那樣，把「江南」的文化意象交由祖籍福建的新加坡歌手林俊傑用國語和粵語分別演繹傳達之時，華語系的各地聽眾辨別《江南》歌詞所想像的「江南」到底位於何處？這一地理概念在文化上的界限和差異是否意味著「我族」（Us）和「他者」（the Other）的對立與對抗？在文化生產、傳播與消費環節中，「南方」的定義是如何在傳統的時間線上被固化、呈現、變形與挪移？

在西方文明發端史上，古希臘文化早期的米諾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與稍晚的邁錫尼文明（Mycenaean Civilization）在建築物質與神祇信仰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南北之別，這種地域文化的差異性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都有持久且深入的討論。其中，海外漢學界也在關注中國文學的地域差異研究，諸如新世紀以來最具里程碑意義的英文書寫中國文學通史——梅維恒（Victor H. Mair）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第一卷——分別在其第七編及其第六章分段撰述南北文學和

周邊文學等地域色彩鮮明的文學類型與樣式。¹釐清「文化南方」此概念亦漸成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關注的一個熱點，2012年10月26日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詩歌與空間」(Poetry and Place)研討會圍繞這一議題展開學術爭鳴，代表論文收入《文化南方與漢唐詩歌》(*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後文簡稱《文化南方》)一書。²有趣的是，這些作者或是北美學者，或是華人移民/華裔學者，身分的「他者性」使得他們在進入中古時期「地域南方」產生代入感，是否與研究對象「文化南方」的邊緣性產生著某種共鳴？

漢唐(漢學界多稱之為「中古中國」)是「南方」概念由現實行政區劃與地理區域的「地域南方」嬗變為文化世界上文本想像和文學形塑層面上的「文化南方」的決定性時期，「文化南方」的意象界定和文獻呈現在文學文本中經歷的書寫過程值得探索與清理。從功能與意義上來看，對於中古中國的士大夫而言，「南方」是逃離當下官宦生活困境的閒適之地，夢境式的文化想像反映的是對逼仄現實的逃避，區別於現實世界的幻想慾望在此處得到釋放；對於中原地區的北方精英貴族來說，「南方」又是「流放」、「疏遠」、「畏懼」、「陌生」的代名詞，是文明中心之外的具有威脅性的邊緣地帶。《文化南方》一書正是聚焦於這一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文化概念並加以系統梳理，以「南方」作為一個宏大的文學場域，運用諸如社會文化學、歷史文獻學、人文地理學、文學人類學等研究方法，通過審視早期以古楚國為代表的大南方疆域、漢朝大一統時期的南方、東漢末年三國時期以吳國為中心以至東晉滅亡後的南方、唐代以後的南方分別在文本、文獻、文化中的展現，將「南方」這一概

1 Mark Bender, "Regional Literatures," in pt. VII "Popular and Peripher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 Victor H. Mai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15–31. Michael A. Fuller and Shuen-fu Lin, "North and South: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ch. 6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To 1375, ed. Stephen Ow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65–556.

2 此為本文作者所擬譯名，中文版正在翻譯但尚未出版。

念從政治、地理、文化等不同層次上進行歷時性界定與區分，透過具體文本細讀以提煉共時性集體文化記憶，從而構建對後世影響綿延豐富的文化南方意象。

長期以來，中國內地文學史或文學作品選將北方文學奉為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主流，而對同一時段的南方文學則相對漠視；³ 相對而言，偏重於新歷史主義和文化唯物主義批評的北美漢學界較為關注文學史主流之外邊緣的、碎片的、共生的、弱勢的文學文化現象。向中古中國地處邊緣的南方世界投去目光、傾注心力最多的前輩學者當屬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其「百科全書式」的名物研究對當代漢學研究影響深遠，除了代表作《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1963）之外，他在《閩國：10世紀的中國南方王國》（*The Empire of Min: A South China Kingdom of the Tenth Century*, 1954）、《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1967）、《珠崖：12世紀之前的海南島》（*Shore of Pearls: Hainan Island in Early Times*, 1970）一系列書寫南方中國的著作中探討中古中國周邊文化與中心漢文明的互動及影響，已為邊緣化的「文化南方」開導先聲。

受益於《朱雀》的啟發（“a major source of inspiration”，頁15），《文化南方》一書薪火相傳，更進一步試圖清晰呈現「文化南方」在中古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文本內涵與外延。該書由華盛頓大學王平（Ping Wang,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與香港大學魏寧（Nicholas Morrow Williams, 先前任職於香港浸會大學）編此選篇並合寫導言〈象徵意義上的江南〉（“Southland as Symbol”），分別收入華盛頓大學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南金與羽扇：陸機的南方意識〉（*Southern Metal and Feather Fan: The “Southern*

3 中國內地高校中文系通行的文學史或文學作品選教材如：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簡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皆偏重默認北方主導中國文學發展進程。

Consciousness” of Lu Ji)、哈佛大學田曉菲 (Xiaofei Tian, Harvard University)〈擬作：二陸與南北間的文化交融〉(Fan Writing: Lu Ji, Lu Yun and the Cultural Transaction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王平〈「怨」、抒情體與南方〉(Plaint, Lyricism, and the South)、科羅拉多大學柯睿 (Paul W. Kroll,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比「南」更南：在蠻荒福建的江淹〉(Farther South: Jiang Yan in Darkest Fujian)、魏寧〈傷春：王勃與李白對南方文學主題的再想像〉(The Pity of Spring: A Southern Topos Reimagined by Wang Bo and Li Bai)、莫瑞州立大學吳潔 (Jie Wu, Murray State University)〈羊碑習池：襄陽的兩個詩學典故〉(The Stele and the Drunkard: Two Poetic Allusions from Xiangyang)、哈佛大學宇文所安〈九世紀以來的江南：論慾望的慣習化〉(Jiangnan from the Ninth Century On: The Routinization of Desire)。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學術論文集書成眾手、各自為陣的缺陷，此書圍繞「文化南方」的文本構建顯得體系井然。導言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的「南方」所對應的文本內涵的梳理與分析，既概要交代漢唐文學中南方的總體文化背景，又巧妙推介繫於一時一地的正文各章的意況大旨。主體七篇彼此東鳴西應、互為鏡像，各文章章節內部以及文章與文章之間存在相互指涉關係，如田曉菲文的關鍵詞巧用“fan”既有「扇形物」又有「崇拜者」的雙關之義，既直接指向陸機在〈羽扇賦〉中對自我形象的隱喻，又暗合其作為北方文化崇拜者的另類定位，還是對前篇康達維文中陸機貴族身分建構問題的呼應和創見；柯睿文對江淹時代福建的「南方」性文本重建既是對前輩薛愛華的《閩國》一書的致敬和拓展，其“darkest”又呼應後面宇文所安文以「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重新審視江南語言審美符號的嘗試，而「南方」在九世紀之後成為想像的慾望世界的文化基因密碼也正是來源於無數疊加的互文性文本。基於共有主題身分「認同」(identity)與「疏離」(estrangement)的對立與統一，此書在三方面的拓深值得學界關注：

首先，著眼於彰顯書寫南方的文本地理空間與文學想像空間彼

此的張力。在漢唐文人的心目中，「南方」是疆域界限不斷變化、既陌生又熟悉的地理空間概念。關於南方的文化意識源自楚國，雖然是地與北方中原的文化傳統差異甚大，但仍牢屬於華夏文明的涵蓋區域，文人通過把文學經典《楚辭》和流放貶黜人物屈原納入中國文學傳統主脈而形塑出早期的南方文本世界，地理政治中心的「疏離」與文化文脈承續的「認同」形成某種悖論。西晉亡國，權力南移，長江流域及以南在地緣位置上的變化與正統文化賡續超越的雙重關係越發重要——「疏離」的地緣要如何正朔為「認同」？以陸機為個案，康達維與田曉菲從兩方面闡釋羽扇自喻背後所隱含的文化身分問題：一是陸機對自身吳國貴族身分的高度認同和在與北方文化精英潘岳的文學競爭中呈現出強烈的自覺南方意識（southern consciousness，見頁 19）與文化依戀（cultural attachment，見頁 33），二是從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層面以二陸兄弟為代表的南方精英階層利用自身優勢行使文學創作的話語權力而對北方進行想像書寫 / 改寫。陸機試圖以南方文化資本的占有和重置對北方文學傳統（樂府詩）進行改造以期融入北方話語體系、爭取文化身分正統。南方遺民在北方主流階層的接受或排斥，就如同羽扇一樣被視作好奇心與懼怕感共存的南方異域玩物，南北雙方在文化意義上的文本世界中不斷相互想像並模糊體認。事實上，「南方」、「北方」是一組歷史上的相對概念，流離失所的六朝貴族完全適應長江流域之後，只有「南方以南」（farther south）才能喚起曾經有過的身分危機感。柯睿將視角轉向「生於斯長於斯」的江南名門貴族、因政治流放至蠻荒福建的江淹，運用心理分析對其涉閩賦作進行場景還原，從文本入手分析失卻文化身分的文人對南方以南的恐懼與憂慮，以此來觀照江淹如何通過對《楚辭》「元文本」（ur-text）的改寫在心理上適應地理空間上的「新南方」。書寫南方的文本地理空間與文學想像空間的張力是本書關注的焦點之一，在不斷的文本改寫、重組、變形中「南方」被具體化、情境化、經典化，使得對南疆、南土、南鄉、南荒的敘述漸有程式化之嫌，但是後世文人仍然通過在場或者不在場的方式（如夢境、回憶）去構建屬於自己的

「南方」。

其次，側重於辨析塑造南北的城市文明空間與性別文化色彩相互的差異。城市文明空間往往具有形塑地理人文品格的意義，該書別出心裁地從性別研究的角度關注這一社會文化現象在漢唐時期的地域對立對照關係——以洛陽、鄴城為代表形成的具有男性特質的北方城市群和以金陵、揚州、杭州為代表形成的具有女性特質的南方城市群——分述地域南北在文學創作和文化想像中「被」賦予的性別特質的慾望色彩。魏寧通過對王勃詩和李白詩的文本細讀追溯〈招魂〉的文化生成影響，「楚辭」中的固有地域、語言與意象在唐代詩人筆下「傷春」主題裡被增添了哀愁的、遺憾的、短暫的符號意味，植根於南方抒情傳統的形式和情感都具有顯著的性別特徵。王平反思鍾嶸《詩品》將「楚臣」（屈原）與「漢妾」（王昭君或班婕妤）並置這一提法，聚焦於「疏離漢廷（Han court/palace）」（見頁 81）的劉細君、王昭君、班婕妤、蔡文姬四位「漢妾」的抒情「怨」詩，論證在史纂的操縱、詩歌的傳播、大眾的想像和意識形態的形塑等多重作用下，「怨」這一南方抒情母題的演化過程在性別化、地域化、邊緣化之間的內在聯繫。唐代重建統一帝國以後，隨著前朝政治地位的下降和中心權力的流失，「南方」成為一種被懷念、被追憶的文化遺產，宇文所安以「江南佳麗地」這一文本意象從六朝到趙宋的流變為切入點，指出文人借助文本世界想像南方在心理上遠離紛擾政治權力中心，而構建「文化南方」的詞彙語料庫中的意象（如春夢、紅蕉、吳娃、皓腕、芳春）始終充滿性別象徵性和詩意模糊性。「江南好」的主題書寫往往闡發於「追憶」、「回憶」、「夢憶」等差異時空的語境，暗示了中古後期文人在面對與北地氣質不同、「貴於清綺」⁴的南方溫柔鄉時的陰柔心理取向，因此刻意樹立具有一定時間與空間距離感的書寫姿態，從而規避被道學家所指摘詬病的話語方式。

最後，立意於構建南方文學母題的動態互文網絡與文本

4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6冊，卷七六，〈文學傳·序〉，頁1730。

影響意義的互涉。就研究方法論而言，各篇都有深受互文理論（intertextuality）影響的痕跡，正如前文所提「七篇彼此東鳴西應、互為鏡像」，既然地理空間和文學世界的「南方」界限從未固定，南方文學傳統和文化南方意象也理應被視作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互文網絡，漢唐文人借助早期文學傳統的累積並反覆對其加以文本回應與重置挪用，甚至以「粉飛客」（fanfic）之姿擬調、擬篇、擬作，將「文化南方」逐漸從黏膩潮濕的地緣澤國轉換為內蘊多元的文學母題（topos），在過去和現在的視野融合中產生新的文本闡釋和影響意義。吳潔選擇南方楚國城市襄陽的羊公碑和習家池為例，探討以「懷古」（reflection on the past）作為表現方式的文學慣例來彰顯個體生命的短暫無常與造物自然的亙古永恆之間的矛盾張力；羊碑、習池在文本世界既是地理空間也是詩性場域，它們不斷被賦予歷史背景、文學典故、象徵意義和想像資源的層級累積，使得後世詩人在用傳統文學慣例回應書寫時也將自己的處境命運與先前的文化名人相聯繫以尋找或確認自己的文化身分，由此構建文學地理、身分、資本、心態之間的互文聯絡。田曉菲注意陸氏兄弟為自己南方貴族身分感到驕傲的同時伴隨著對北方顯赫城市（如洛陽）和知名人物（如曹氏一族）的崇拜和模仿，魏寧以人類學與宗教學的視角闡述《楚辭·招魂》和上古時期靈魂信仰的永恒觀念對王勃和李白文學創作的影響，宇文所安提出「憶江南」逐漸成為同題寫作下的共同建構主體，寫詩的人可能並沒有真的出現在江南或者去過江南而只是一種對前人之作的回顧和致敬，這些篇章都呈現出聯繫南方文學母題的文本互文勾聯與文本影響意義互涉的研究特色。

漢帝國一統中華以來，《楚辭》的語言藝術深刻影響著賦體文學特色的形成，而這種充滿楚地南方色彩的文學傳統在漢唐時期也被逐漸編纂和規範。作為一種以文人自我觀念為核心的文學創作類型，書寫南方不僅僅在於延續、夯實「怨」情傳統，後世貶謫文人亦不斷重新協商、建構和確立「南方」相對於北方中原的文化地位，對南方文化優越性和獨特性的承認與偏好以及對南方疆土異域性和外來性的衝擊和焦慮始終纏繞交織。從憂怖臆想到癡妄迷戀，漢唐

文人與南方世界的關係也在「身分認同」與「身分疏離」之間遊移。討論「文化南方」意象在漢唐時代的建構、形塑與變形，能為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發展和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承提供嶄新的詮釋角度與立意空間，並且能夠促使反思主流文化「正統性」(orthodoxy/legitimacy) 視角下地緣政治文化「邊緣性」(marginality/periphery) 是否合理或矛盾。

倘論不足，此書仍受限於論文集的體式而無法與學術專著的理論厚度相媲美，中心論點稍顯散亂，地域分布略見缺失，作者水準高下有差，即使學界耆舊亦不免失手，如宇文所安英譯白居易〈憶江南〉「早晚復相逢」譯成“sooner or later I'll meet them again”，顯然是沒能正確理解「早晚」一詞在中古漢語中是「何時」(when) 之義。此書選擇在香港出版，一方面是有主編之一的魏寧博士先前供職於香港浸會大學，出版受到該校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資助的緣故，另一方面也有本書「文化南方」主題涉及當今大中華地區地緣政治關係的特殊考量。但遺憾的是，該書並沒有讓確有文學實績的嶺南、巴蜀等南方地域書寫參與到「文化南方」意象建構中來，難逃以偏概全、白璧有瑕的指摘。

此書面世之後，「文化南方」的身分認同與疏離的研究思路在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界持續發酵：田曉菲的《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The Halberd at Red Cliff: 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 2018) 以「銅雀臺」為文學場域中心探討北方正統之外的南方文學視野而提出「南方視角」(southern filter) 之說；王宇根《萬里江湖憔悴身：陳與義南奔避亂詩研究》(*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 The Works of Refugee Scholar-Official Chen Yuyi (1090–1139)*, 2020) 分析陳與義作於避難尾聲時的〈梅花〉二首亦借助「南方疏離」(southern estrangement) 的提法來與其前期作品比較。此外，此書的拓新意義更在於結合「文化南方」的身分認同與疏離問題來與當今「南北」之間的差異隔閡展開有意義的超時空對話。此書的中譯正在進行中，相信中文學界很快就能對這一議題展開更深入而細緻地本土化檢討。